

除了“买买买”，完整的内需体系还需要什么

王振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等目标。《建议》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可见,内需拉动经济,绝不是仅仅依靠“吃吃喝喝”的消费、“买买买”的购物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构筑完整的内需体系。尤其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所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8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体现在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需达到一定程度。目前世界十大经济体,除中国外,还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俄罗斯。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56.6%,其他九个国家均超过70%。如果再细分最终消费率的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24年我国为39.6%,在上述十国中是最低的。

《建议》要求“十五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8.7%、38.5%、38.9%、39.2%和39.6%。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年期间,与上年相比,每年居民消费率始终没有达到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5年后要达到目前俄罗斯50.8%的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就需要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十年后要达到目前俄罗斯50.8%的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就需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此目标,就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取决于居民消费率,也取决于政府消费率。但是“十五五”期间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政府消费率,因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2024年我国政府消费率为16.6%,低于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俄罗斯和意大利。政府消费用途主要是聚集公共服务与自身运转的当期消耗性支出,如教育、医疗、国防、公共管理等日常消费与人员薪酬。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既有利于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也有利于助推内需主动力。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是明智之举。我们看到,虽然2025年政府

财政收支压力不小,但民生投入不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4.4%,其中教育支出增长6.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5.9%,卫生健康支出增长5.3%,也就是说,在投资于人的增速方面高于GDP的增速。今后,我国以养老、医疗、教育、失业保险为重点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持续流动的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只有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才能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

根据《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的民间投资2013年增速为20.1%,2024年下降为负增长(-0.1%),我国的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2014年为57.8%,2024年为50.1%,十年期间下降将近7.7个百分点。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2012年突破10万亿元,2017年突破20万亿元,但2021年至2024年的规模都在25万亿元徘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有待优化。值得我们参考的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2024》对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评估,例如在关于监管框架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几乎不分上下,新加坡居第14位,中国香港居第13位。但在关于公共服务方面,新加坡居第2位,中国香港居第16位。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政府直接提供或委托民营企业间接提供的,为促进企业发展的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这些几乎涉及了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内运营运行所需的重要环节。民营企业是各国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对各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2024》中有一系列对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帮助的公共政策和法规,促进企业开设创办、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便利、创造良好就业机会、促进非正式员工及企业向正式员工与企业过渡等。在诸多的激励政策中,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机会平等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这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

2025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阻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不少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下造成的,其结果无疑会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也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实践表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特别需要关注民间资本运转所具有连续性。这意味着一旦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企业固定资本的正常周转,固定资本的闲置时间越长,不仅损耗更大,而且必须支付的劳动力费用也更昂贵。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曾指出:“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因此,保证以货币为媒介的国内融资渠道流畅无阻以及保持金融供给的充足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十分适时的。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十五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必然结果。但是目前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方面还存在短板。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不少就业歧视现象,如户籍歧视、性别歧视,以及毕业学校的歧视。2035年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构想之一,就是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浙江将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确保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提高生活品质。

再例如,在土地市场方面,还欠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际调研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令人困惑的现象,特别是有的地方即使农村的建设用地价格达到了城乡统一的标准,但在农村建设用地上面所开发的财富流转,仍被局限在集体经济成员之间进行开发,目前还无法更广泛社会意义上的财富增长。因此,消除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开发后阻碍财富流转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仍需大刀阔斧改革推进。

尤其身处当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是迫在眉睫。比如,审计署审计披露,至2025年3月底,由于税务与海关、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和利用机制,2021年以来共少征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费724.23亿元。上述例子也许挂一漏万,但无不说明,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需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持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周刊

8 长江日报

2026年1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刘功虎 美编:陈昌
版式:三 刚 责校:文胜

青马在线

让乡村成为机遇之地

黄铭卫

最近,农民可以评职称一事持续引起关注。这不仅是人才评价的一次创新,更是对“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的切实回应。

当前,农业正从传统生产转向现代产业体系,急需高素质、专业化的经营主体。然而,乡村人才流失与结构短缺问题依然突出。

变革乡村振兴的价值定位,首先要打破农民延续千年的“身份叙事”。长期以来,“农民”一词常被固化为出身与地域的标志,忽视了现代农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的专业属性和内部的能力差异。

破,是破除“唯学历、唯论文”的旧门槛,打破将农民视为固定身份的社会观念;立,是确立以实践能力、带动效应、创新成果为核心的新评价体系。让田间地头的实绩,享有与实验室成果同等的价值认可。这是标准的革新,更是价值观的重塑。

职称评定不是终点,而是系统性赋能乡村的开始。现代农业竞争,本质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职称体系使农民的经验与技术转化为可积累、可评价的“人力资本”,激励在乡农民提升技能,吸引“新农人”返乡创业,推动新质生产要素向农业聚集,从而扎实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制度的关键在于“含金量”。将职称与信贷支持、项目扶持、社会荣誉等挂钩,就能构建“技能有通道、贡献有认可、发展有支持”的良性循环,把外部“输血”转化为乡村内在“造血”能力,真正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妙”。

这项改革,也在推动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观念变革。它向社会传达:农业是有前景、有尊严的职业。乡村振兴需要青年,而青年需要清晰的职业路径和成长沃土。唯有让乡村成为机遇之地,青春力量才会主动汇聚,乡村振兴才有不竭源泉。

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全面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辽宁的探索,正是要培育“有自信、有技能、有抱负”的新型职业农民,推动他们从传统生产者转变为现代农业经营者和乡村振兴主体。

当农民成为发展成果的分享者、现代文明的享有者,当乡村成为安居乐业、创新创业的热土,乡村振兴才能获得最持久的内生动力。这项改革,不仅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引擎,也夯实了共同富裕的根基,增强了我国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作者单位为辽宁大学)

城市发展新逻辑:内涵做优,区域做强

冯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同时作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部署,既明确“城市不能摊大饼”,又强调区域联动,这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不要“摊大饼”与城市组团式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同向发力。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推动高质量城市更新”“引领都市圈深度同城化发展”,就是对这一发展逻辑的生动践行。

既反对“摊大饼”,又追求城市群协同发展

应对大城市病,需从根本上摒弃粗放式的“摊大饼”发展模式,转向以内涵式提升为核心的新路径。为此,关键一招在于科学合理地发展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带,通过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与功能分工,从而有效破解资源约束,全面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组团式发展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抓手,将城市规模锁定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内,城市内涵式发展则以城市更新为载体,通过低效用地再开发、老旧小区改造、产业园区升级等手段,推动产业与人口再平衡,实现存量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

区域协同是区域能级跃升的加速器,核心是构建一体化发展格局,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区域整体效能。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规律,但单极过度集聚易导致要素配置失衡,而都市圈、城市群作为区域协同的重要载体,能够推动发展从点的突破转向系统的革新。其要义并非简单的空间扩容,而是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分工协作、设施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为支撑,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区域发展共同体。

在我国,19个城市群已承载全国70%以上人口,贡献8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深圳都市圈“总部+基地”的产业梯度转移格局、长三角都市圈交通一体化推动通勤便捷化的实践充分证明,“强协同”不仅能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激发消费与投资潜力,更能为中心城市“控规模”创造宽松环境,是释放区域发展红利的关键路径。

既合理控制城市空间规模,又通过区域协同推进大片城市群发展,二者辩证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二者目标同向,均以人城和谐共生为宗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路径互补,“控规模”要求中心城市聚焦核心功能,为协同发展提供引领,“强协同”通过资源整合疏解中心城市压力,为内涵发展创造条件;成效互促,“控规模”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力,推动“强协同”高质量推进,成熟的协同机制又能反向约束城市无序扩张,形成良性循环。

走出集约高效新路径

坚持系统思维,以规划协同为引领、产业协同为核心、服务协同为支撑、治理协同为保障,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协同联动的城市发展新路径。

——规划协同引领。树立“一盘棋”思想,推动规划

从单个城市向区域统筹转变。强化顶层设计,科学划定都市圈范围和城市开发边界,将“控规模”约束与“强协同”布局有机结合。东京都经过五轮首都圈整备规划,成功实现了从单核集聚到多核分散的城市空间结构转型。优化空间结构,推行组团式、网络化发展,构建中心城市—次级城市—特色城镇的多中心格局,明确中心城市聚焦高端服务与核心研发、周边城市布局先进制造与生态休闲的功能分工,形成优势互补的空间格局,避免单中心过度集聚。

——强化制度保障。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健全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机制,设立跨区域议事协调机构,打破行政壁垒对协同发展的制约。同时,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建立产业转移、生态保护、税收分成等领域的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通过要素入股、税收返还、生态补偿等方式,平衡区域间的利益分配,保障协同各方的合理收益。例如,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给予财政补贴,对生态保护贡献较大的地区给予生态补偿,激发区域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

——产业协同联动。产业协同是“强协同”的核心动力,也是实现“控规模”的关键路径。要打破同质化竞争,推动产业从单城集聚向圈域协同转变。明确分工定位,形成“中心城市侧重研发设计、周边侧重智能制造”的格局,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转移,培育“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模式。搭建协同创新平台,联合建设跨区域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共同体与成果转化中心,促进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全域联动体系。

——服务协同共享。一是扩大优质资源覆盖范围,通过建立跨区域学校分校、医院分院、远程医疗协作网等方式,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向周边城市延伸,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制度,降低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动力。二是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建立区域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明确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服务质量标准,加大对中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

(作者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用好城市更新
这个重要抓手

善把『槽点』当作『发力点』

吴桂桃

基层工作中常常会听到“吐槽”,有的是群众反映意见,有的是网友上网吐槽,一些干部对此如临大敌,这是大可不必的。深入基层做工作要有看待和对待吐槽的本领,首先是要学会分辨,哪些是因为基层工作不到位引起的,哪些是别有用心者的言论。后者且不论,单说前者,来自群众的吐槽需认真对待。

贯彻落实党的决策部署,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稳步发展,为群众创造更多实惠。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推进方法与实际有差距,也可能干部作风有些浮躁,影响群众利益,招致“吐槽”。干部履职的成效,为民服务的质量,都可能是群众的“槽点”。这些“吐槽”,既反映社会的评判,代表群众的心声,也是工作绩效的“晴雨表”。

要客观看待群众“吐槽”。作为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道是常态,难免经常听到“吐槽”,某个纠纷处理不公平,那个项目质量有问题……有的干部听到这些,视为“杂音”,认为是“唱反调”,故而不愿听不想听,甚至疏而远之。古人云:“物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对干部不满意,“吐槽”就是群众的表达方式。这些“吐槽”,说明政策存在问题,干部服务不到位,不能视若“洪水猛兽”,应视之若为苦口良药,逆耳忠言,才能不断匡正为政之失。

构建“吐槽”释放环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虽然在基层,却是建设发展最前沿,他们的意见,很多时候恰恰代表发展方向。“道吾恶者是吾师”,虽然“吐槽”话刺耳,可能是风凉话,也可能正话反说,但话虽丑理却正。群众愿意“吐槽”,是对党和政府抱有期待,对国家社会负责任,应当鼓励他们“吐槽”。要有开门纳谏的气量,敢于承担责任,勇于“吐槽”处打捞民意,营造人人敢讲真话、事事能说真话,开明开放的社会环境。

从“吐槽”声中察民意。掌握社会思想动态,知晓人民群众心声,是为民执政的基本功。俗话说:“鞋子合不合脚,穿鞋的人才知道。”考核政策的效率,评价干部的成绩,群众最具有发言权。看似茶余饭后“吐槽”,实质是对社会的评判,对党政干部的评判。知人短长,晓自身短处。群众的“吐槽”是面镜子,能够照出谋事不足,看到干事的短板。因此,要静心听取“吐槽”,从“吐槽”了解社会动态,掌握群众在想什么,他们的诉求有哪些,希望党和政府怎么做。从“吐槽”中学到的社情民意,是难得的执政之咨,是治国决策的重要参考。

在“吐槽”中校准着力点。群众“吐槽”是账本,记录施政的过失,装满服务的差距。不把“吐槽”当讽刺,要将“槽点”释放出来,从中检视自身过错,发现政策的偏差,找出执行的“短板”,厘清为政的方向。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不知道群众诉求,不懂得履职如何发力,有劲找不着着力点,导致工作无头绪,干事缺乏方向感。将“吐槽”听耳中,分析原由记心中,梳理问题进日程。不妨多听群众“槽音”,群众在“吐槽”什么,说明哪里存在问题,就要努力去解决什么,工作才不会偏离航向,为民服务才有发力支点。

(作者为基层公务员)